

## 研究論文

# 客家群體的形成：胡文虎與其客家社團

張容嘉\*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摘要

1920年代初期，客家第一次從區域性分散的地緣性團體，聯合成立「客屬」組織，開創全球客家族群的連結想像。胡文虎無疑是在整體客家想像建構過程中重要的關鍵人物，香港崇正總會創立後，陸續展開客家族群研究以及跨域客家社團的串聯，胡文虎一方面透過資助羅香林創立客家學，考證客家源流，建立客家族群的論述，推進客家共同意識的形成。另一方面也藉由羅香林的論述宣揚客家意識與客家文化，推動創建新馬各地的客家分會。

然而來自不同祖籍地，彼此間的腔調及語言使用甚至是難以相互溝通的客家人並非理所當然即形成想像的群體，本文擬透過考察胡文虎與其打造客家網絡的過程，探究 1920 年代客家的論述，如何透過印刷報業的傳遞擴散及客家社團間的情感連結，將祖籍、腔調殊異的各地客家人凝聚成想像的共同體。

**關鍵字：**客家、胡文虎、想像共同體

---

\* 張容嘉，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通訊地址：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電子信箱：mornika426@gapp.nthu.edu.tw。

##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kka imagined community: Aw Boon Haw and his Hakka associations**

**Jung-Chia Ch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Tsing-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Hakka people were dispersed into regional groups until the early 1920s; formal Hakka organizations were first established, and the imagination of Hakka linkage was then created. Aw Boon Haw is undoubtedly one of most important iconic persons in the Hakka ethnic imagination, in the ways the Hakka people construct a united identity when they were originally separated in different ancestral home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discourses of Hakka identities in the 1920s, by gazing into the life of Aw Boon Haw, and also examining how he established a Hakka network through propaganda in the newspapers, and also via an emotional umbilical cord within Hakka associations, so that Hakka people, who have different family origins and accents, created their imagined communities.

**Keywords:** Hakka, Aw Boon Haw, Imagined Communities.

---

\* Jung-Chia Chang,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Tsing-Hua University, Address: No.101, Sec. 2, Guangfu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 30013, Taiwan. ; Email:mornika426@gapp.nthu.edu.tw.

## 一、客家意識形成的歷史脈絡

關於客家形成的討論，在整個客家知識體系建構裡一直是許多客家研究學者不斷投入的研究課題。近二十年探討的重點從客家稱謂的涵義，逐漸轉向至論述客家稱謂的產生緣由，研究客家產生的時間、地域與背景，以及從他稱到自稱的語意轉換等。施添福（2013：7-8）考察客家總體歷史的演變，認為客家的概念基本上是從本貫主義的「客家」向方言主義的客家轉移。民國時代的客家知識界和中國知識界基本上已接受方言主義客家的概念，羅香林 1933 年發表的《客家研究導論》，所提出的客家民系概念即是在方言主義客家的概念基礎上，樹立了 Hakka 客家源頭發展的里程碑。當客家稱謂從本貫主義分類下帶有貶義移民之意，逐漸回歸中性人群分類的概念時，對於客家自我認同意識的形成即有著相當大的助益。客家的概念也伴隨著西方傳教士設立的傳教站、學校以及醫療診所等訊息流通管道，與客家知識界對於客家民系概念的討論與傳遞，逐漸在民間社會擴散（施添福 2014：6-7）。施添福（2014）文中著墨較多的是西方傳教士將 Hakka 定義為客家，為客家方言群統一名稱的過程，尤其是巴色會伴隨著客家傳教事工，重建客家族群的歷史圖像與社會文化的特徵，更是傳遞客家概念與認同意識的重要推手。另一條與傳教士系統平行的路線則是本文的研究重心所在，從胡文虎參與香港崇正會以及南洋客屬總會的行動，搭配胡旗下龐大報業集團的訊息傳遞，觀察客家族群如何隨著胡文虎的召喚團結/凝聚起來。

當客家族群從分散的祖籍地緣認同轉向到客家方言群的認同，一方面意味著一個新興人群認同方式的出現，另一方面則反映了當

時客家人所面臨的歷史處境與需求。林正慧（2013）在《華南客家的型塑歷程之探究》文中即指出，在宋元之際即逐漸形成有共同方言與地域文化的一群人，尚未以「客」名之。而是在明清之際，伴隨著閩粵贛人口飽和，大量客方言人群向粵東沿海或珠江三角洲流徙，伴隨著土客人群衝突與客家正名的運動而生：

由於客方言人群的流寓與耕佃身分，加上人數漸增，方音殊異，與當地以廣府方言為主的「本地人」之關係逐漸緊張，進而在 19 世紀以降，頻頻發生「土客衝突」，且在廣府人書寫的志書當中，多被指為「非漢」之種族。此種現象，引起「邊緣客域」或「中心客區」客方言士子的關注，並以強調客方言人群乃中原衣冠舊族，方言亦為中原古音的方式為「客」溯源。在此過程中，適逢西教東傳，於是以客方言地域為傳教重心的巴色會傳教士們也共同參與為「客」溯源的行列，就約在 19 世紀中葉，中文的「客家」與西文的 Hakka 有了指涉相同人群的意涵（林正慧 2013：112-113）。

清末民初客家人士積極參與城市活動與革命建國等行動，逐漸累積政經實力的同時，面對一次又一次的「非漢」污蔑，更讓「客家」的意識與認同得以抬頭，也讓海內外客屬有了清楚的以方言認同的媒介（林正慧 2013：113）。

陳承寬（1950：3）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的序言裡更清楚地描述了香港崇正總會創會的歷史脈絡：

猶憶三十年前，我客屬人士，僑居香港，以無統屬團體，常遭

意外歧視。同僑前輩賴際熙，李瑞琴，黃茂林，廖斯基，江瑞英諸先生等，怒然憂之。知非團結群力振奮精神，不足以適應環境，奔走呼號，結集同志，以創立團體，命名崇正總會。

究竟當時的客家人遭遇了什麼樣的歧視？羅香林<sup>1</sup>（1950）在〈香港崇正總會史〉詳述客家人常因欠缺被理解，面臨被他族群人士著書歧視的狀況，不得不需要透過客家團體間的串聯行動，以便與對方交涉指正抗議：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國學保存會黃某所編鄉土歷史<sup>2</sup>，謂客家福佬二族，非漢種亦非越種云云，曾引起國內學者嚴正駁斥，並由廣東提學使于式枚牌示更正，其事始寢，是其例也。殊至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西人烏耳葛德（R.D.Wolcott）所編英文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於廣東條下，謂「其山地多野蠻部落，如客家等是」。記述荒謬，客家人士，聞之大譁，群謀交涉更正。於是北京，上海，廣州各地，有客屬大同會之組織（羅香林 1950：2）。

為了針對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書籍記載提出異議，當時各地紛紛成立客屬大同會，廣州大同會的饒芙蓉與姚兩平、黃鍾百也前往香港，與香港客屬人士李瑞琴、黃茂林、廖新基、賴際熙等人聯繫，

<sup>1</sup> 羅香林，字元一，號乙堂。在其所編撰之《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中，分別以「乙堂」、「元一」為名書寫〈香港崇正總會史〉與〈客屬海外各團體之組織及發展〉之文章。本文統一以羅香林稱之。

<sup>2</sup> 黃節編纂之《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出版時間為 1907 年，此處為羅香林記憶之誤（感謝審稿委員之補充）。

共謀交涉事宜，並組成旅港客屬團體，共同響應北京上海廣州的客屬大同會，向商務印書館交涉。最後由該書館聲明錯誤，並且通函各地學校更正，停止餘書的販售，才平息該風波（羅香林 1992：7、丘權政 1997：191-192）。時因旅居香港的客家人以工、商兩界人士為多，並取崇向正義、驅逐邪惡的之義，因此創會定名為「旅港崇正工商總會」，後為擴大範圍，始更名為「香港崇正總會」（石炳祥 1997：53）。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sup>3</sup>則是暨香港崇正總會之後，1923 年由湯湘霖、何仲英等人所倡議籌組：

鑑於客屬同僑南來者日眾，散布區域日廣、人事交接日繁，社會關係日密，非有大團結之組織，不足以聯絡感情，互通聲氣，以收團結互助之效（羅香林 1950：3）。

鑑於國內各地早有大同會之創辦，而香港方面也有香港崇正總會之成立，推動客家人的事務，因此，新加坡設立“客屬總會”，是時勢所趨，水到渠成也（謝佐芝 1997：58-59）。

由此可知新加坡客屬總會的創建是受香港崇正總會及各地客屬大同會的影響，特別的是這些客家社團裡的成員們具有高度移動性，他們在中國、香港、東南亞之間跨域遊走，並且互通聲息。例如胡文虎自身腳蹤即跨越了現代以國境作為區隔的邊界，胡文虎本身是祖籍福建永定、出生於緬甸仰光的客家人，1923 年至新加坡做

---

<sup>3</sup> 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原名為客屬總會，1948 年議決修改章程，並冠以「南洋」二字，更名為「新嘉坡南洋客屬總會」以符其實，強調其作為團結新加坡客家社群，並加強聯繫東南亞各地客家族群的組織（南洋客屬總會第三十五、六週年紀念刊 1967：A1）。

生意，1932 年將其永安堂總行移居香港，旗下報業集團橫跨東南亞與中國，1930 年代他在新加坡積極鼓吹串聯新馬各地之客家人成立客屬公會。又如饒芙裳因為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主張而被清廷通緝逃亡海外，輾轉落腳在檳榔嶼，辛亥革命後返中國，卻仍幾度避走他鄉（賴郁如 2013：287），中間尚參與香港崇正會的創建籌組。而 1963 年日本客家人成立東京崇正公會，香港崇正會的黃石華會長則是幕後重要的推手，香港崇正會並且與東京崇正會一直維持著密切交流的關係。在這些客籍人士的想像脈絡裡，客家人並沒有移居地國籍的差異性，透過串聯跨國客家聯繫網絡的建立，世界的客家從而成為可能，連帶構築跨國經濟網絡的資本連結。

換言之，聯繫客家人之間的情誼、團結互助、發展工商各業實為這群客家社團成員的共同關心。香港崇正總會章程第三條即明白表示崇正會以聯繫國內海外客籍人士為其目的：

本會以連絡國內各地，即海外各埠，同系人士，交換智識，振興工商事業，興辦學校，共謀公益，致証源流，互助同人為宗旨（羅香林 1950：20）。

客屬總會成立宗旨亦明定：「聯絡同屬人感情，促進工商業之發展，舉辦慈善、教育、文化和公益等事業」。曾養甫在〈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序〉更直陳：「客屬總會，為吾海外客屬僑胞共同組織之團體，意在以互助合作之精神，直接謀事業之發展，間接助祖國之繁榮（轉引自王力堅 2010：453）」。有趣的是，通常大部分的會館並不會特別強調「促進工商業發展」，但是香港崇正總會與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卻將這點直接納入其組織章程裡，南洋客屬總會甚至接受客籍人士所開設之工商機構為“商號會員”，以壯大其組

織（吳慧娟 2008：96），更反映客籍企業家對於串聯客家族群網絡，累積社會經濟資本的期待。

1923年胡文虎初到新加坡設永安堂分行，並未及時參與南洋客屬總會的籌備。但隨著他逐漸活躍於新加坡在地的華人社群，則陸續擔任數屆南洋客屬總會之會長。而在日本侵華，客籍人士紛紛走散、香港崇正總會難以為繼的狀態下，胡文虎更承擔起香港崇正總會的會務，帶領香港崇正總會走向積極聯繫團結各地客屬的方向：

今理事長胡文虎先生，尤以各地客屬團體之大聯合與團結為主張，高風所召。彰響必鉅。則今後會務之發展，其方向亦可知矣。所願我全體同僑，在胡先生領導下，精神團結，各盡所能，各憚精力，使我團體事業，日進無疆。則不特本會之幸，抑亦我客屬全體之幸也（陳承寬 1950：4）。

從而胡文虎同時擔任香港崇正會與南洋客屬總會的會長，串聯起香港與新加坡兩地的客家網絡，胡復積極號召新馬各地客屬團結起來，透過推廣羅香林著述的《客家研究導論》，推動凝聚海外客家的認同。胡文虎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序文裡論述客家精神，除了談及傳統的刻苦耐勞、剛強弘毅、創業精神之外，還特別強調團結奮鬥的精神，認為「無論安處家園，抑僑異域，苟遇本屬人士，必聲應氣求，團結一致。內而互助提攜，外而抗拒外侮。」因此主張「首惟加強我客屬各團體之組織，使聯為一貫系統，砥礪道義。力行互助，共謀公益，發展工商，推進社會文化（胡文虎 1950：10-11）」。

何以胡文虎如此強調海外各地客家人的團結？張侃（2004：336）即巧妙地點出在當時會館與社團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它們既是社交中心，又是培養友情和人際關係的場所，也



創造了許多做生意的機會，同時從中產生一些俱有社會威望的社會精英。在 19 世紀，客家人會館在東南亞分布極廣，遍佈新馬各地。這些社會網絡為客家人發展社會資本提供了富有潛力的可能。」胡文虎積極投入打造海外客家共同體的行動，亦反映著當時客家族群的需求，海外客家意識的形成必須放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理解。

## 二、胡文虎的跨界策略

僅管論及胡文虎積極串聯客家社團的行動，可能緣自於胡文虎與陳嘉庚兩位僑領間的不睦，此一部份是進行胡文虎與其客家社團之研究所無法避及的部份，但對於客家研究卻仍有其相當的意義。康吉父（1984）的《胡文虎傳》花了許多篇幅敘述胡陳相爭之事，胡文虎的「客家性」是康強調的重點，例如胡的用人習慣：「辦報也像永安堂一樣，只曉得客家人，最好姓胡，而且是永定客家（康吉父 1984：56）」。儘管這未必代表「客家性」，參照會館歷史即可知，東南亞的會館以祖籍地命名，例如嘉應會館、永定會館等等，特別任用、照顧同祖籍的人士本為當時人之常態，但胡文虎相當照顧同屬客家人士卻也是事實，並且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胡文虎先生，可以這樣講，他站在客家人的立場，新加坡有這種情況.....他就除非照顧不到，照顧得到的，他一定會做。而且當時也有幫派爭論很強，好像福建幫的陳嘉庚，我們客家幫就有胡文虎，所以兩個很競爭的。不過大家都是為了子弟，為了同鄉好啊，雖然有什麼矛盾競爭，我們應該說是良性的啦。不是打打殺殺，而是比高低，競爭進步罷了，並不是壞事。矛盾是很嚴重了，不過是良性的（胡冠仁 2005：23）。

關於胡陳交惡的脈絡，康吉父略顯保留的描述反而是相當耐人尋味的，康吉父（1984：64）小心翼翼地指出，在胡文虎遷居新加坡之前，陳嘉庚就已是公認的僑領、福建會館的主席，控制著中華總商會。胡陳不睦的重點或可能在於康吉父簡短帶過的幾行字：

胡文虎是客家人，可是他是「福建客」，所以到了星加坡，他也算是福建會館的當然會員，也參加了陳嘉庚的怡和軒俱樂部，而且捐助了一筆數目可觀的捐款」。但是「好景不常，陳胡的交往不久發生破裂（康吉父 1984：64）。

簡言之，康吉父詮釋胡陳之間的對峙『是幫派關係：一個是客家人，一個是福建人。也是事業上的競爭：胡文虎固守本業藥行，對於陳氏並無侵犯，可是陳嘉庚的部下卻也有人經營藥業，甚至製造「鐘標」藥品跟永安堂的虎標良藥對壘。一但對立的局面形成，對壘就陸續變成全面性的：陳家有個「南洋商報」，胡家就辦個「星洲日報」。陳嘉庚有個招待親友部屬的「怡和軒」俱樂部，胡文虎就有個「威爾基俱樂部」。甚至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南洋華僑普遍發動統一合作，募捐救國，陳胡二氏仍然不能言歸於好，兩人都相爭為國，可是你幹你的我幹我的：陳氏有他的南僑總會，胡氏卻寧願自己流為一位「獨行俠」，舉家去了重慶（康吉父 1984：54）』。究竟胡陳不睦所反應的福建客家間幫群的競爭狀況為何？我們其實能夠透過觀察胡文虎在南洋串聯客家會館的行動，觀察客家勢力如何透過胡的召喚集結整合起來，看見當時客家人團結的需求。

胡文虎身為祖籍福建永定的客家人，在新加坡並沒有族群優勢，初來到此地，要與陳嘉庚所屬的閩系集團分庭抗禮，他選擇採取跨界策略，透過對於文教、體育事業以及對於客屬社團的大量捐

贈，串聯起跨地域的客家團網絡，以客家精神作為旗幟，號召團結不同地域的客家人，串聯起世界各地的客屬分會，從而建立起自己的商業王國，他的永安堂藥網與星系報業集團因此確實紮根在客家人的世界裡（李培德 2012：66）。胡文虎 1939 年積極地推動籌劃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活動，一再地強調客家族群要團結，透過旗下的報業集團在報紙上號召南洋各地客屬應組織起來，實現客屬的團結，進而抗戰救國團結一心。王力堅（2010：454）即明白指出南洋客屬總會十週年慶祝活動其實有著雙重目的，顯性目的在於呼喚人們團結參與抗戰救國，隱性目的則在於「有效地組織、掌控、領導南洋各地客屬社群，除了壯大客家社群力量，有效實施抗戰救國活動外，也確實起到以強化客屬社群內部團結來抗衡以陳嘉庚為首的福建社群的作用」。安煥然（2009：93-94）觀察柔佛客家人 1930 年代中期在胡文虎大力推動南洋客屬總會下，紛紛創立各地的客屬公會，也認為客屬公會的創建與客家意識的強調，對於原本鬆散而意識薄弱，祖籍地緣認同較強且分立的客家社群，確實有整合並且壯大客家人勢力的效果。

然而，客家共同意識的建立，還必須搭配多方面的行動，像是在各地串聯創建客家社團、龐大的報業集團訊息傳遞，並且舉辦將人們串聯在一起的活動才能達成效果。舉例而言，1929 年創建的南洋客屬總會，儘管已經成立十年，但由於各地客屬組織並沒有同時建立起來，致使南洋客屬總會陷入一個有總會而無分會的尷尬狀態，無法實際有效達到統合南洋各地客家社群的功能（王力堅 2010：439）。也因此南洋客屬總會十週年的慶祝活動即為此目的而來，胡文虎以「天下客屬本一家，都是同聲同氣同風俗的，實不該因畛域之區別而疏遠」作為號召，一方面派遣代表到各邦鼓吹成立

客屬公會，另一方面則透過報社將客屬總會的紀念活動作即時報導與宣傳，召喚南洋客屬團結統合在一起。柔佛各地的客屬公會即是在這波風潮下所成立。可惜的是，根據安煥然（2009：95）的田野調查發現，戰前如火如荼的客屬公會成立運動，在日本入侵馬來亞後即告中斷，有些客屬公會在戰後並未能成功復辦，客家公會推動的客屬認同仍處於與祖籍地緣認同並立的狀況。因此安煥然認為客家意識的形成需要的是一整套深層的打造與持續建構的過程。

### 三、如何想像？如何連結？—客家想像共同體的形成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書中將民族定義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透過印刷資本主義的流通，讓一群彼此原先互不相識的一群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與關係之下，藉由傳播科技（印刷品）與語言的結合，創造出彼此相互連結的意象（Anderson 2012：86）。

它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大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Anderson 2012：41）

印刷語言藉由印刷字體與紙張的中介，讓原先口操多種類方言群無法相互溝通交談的人們之間，相互理解成為可能，從而創造了一批透過文字閱讀而建立起相互連結想像的讀者們，形成民族想像共同體的胚胎。Anderson 指出資本主義、傳播科技和人類語言這三個條件的結合，讓新形式的想像共同體成為可能。

1920 年代開始，散居在各地，祖籍、語言腔調各有差異、互不

相識的客家人，也開始透過各種不同的行動逐漸形成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香港崇正會自 1921 年創會以來展開客家族群研究以及與客家社團的串聯，胡文虎與羅香林間的合作扮演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推手。胡文虎擔任香港崇正總會會長期間，一方面將客家同人的組織遍及東南亞，另一方面也將客家文化的研究與發展推前一步，捐出巨資資助香港大學的學者羅香林（同時也是崇正會的理事）等，根據客家族群的姓氏族譜進行客家源流的學術研究（鄭赤琰 1999：5-6）。無疑地，胡文虎在整體客家想像建構裡擔任相當關鍵的角色。身兼香港客家崇正總會及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會長的職務，不僅團結新馬地區的客屬人士，也扮演串聯東南亞各地客家人以及世界各國客屬僑團間的聯繫橋梁。1937 年抗戰爆發後，胡文虎更努力推進客家社團組織的發展，特派代表丘子夫、范長峰到南洋各地宣傳組建客屬公會，並大力資助各地客屬公會的籌備費用。從而在短短一年中共有 53 個客屬公會成立，分布在馬來亞、沙撈越、印尼、緬甸等地。簡言之，胡文虎一方面透過資助羅香林創立客家學，定義考證客家源流，建立客家族群自己的論述。推進客家共同意識的形成。另一方面也藉由羅香林的論述宣揚客家意識與客家文化，創建各地的客家分會。胡文虎尤其提倡客家精神與客家意識，促進客家的自我認同，甚至逐漸搭建起客家的世界性連絡組織（張侃 2004：75-76）。

香港崇正總會成立後即積極出版了由會長賴際熙所領導編纂十五卷的《崇正同人系譜》，透過結合譜牒與方志的體例，詳述客家族群的源流與遷徙，從文化源流上去證明客家民族的優越性（陳麗華 2005：5-6）。並且大力資助學者羅香林的客家論述，以及相關客家刊物之印行，推動世界客家大會、客家學術研討會的召開，讓客家

族群祖源的神話以及客家大遷徙的傳說更為清晰為人所知，召喚語言間不一定能夠相互溝通、彼此互不相識的一群人，俱偕成為「客家」之一員。然而，這樣的客家論述又是如何擴散的？如何將學院的客家論述從學者、工商界企業人士推展及於市井小民？顯而易見，這種世界性客家意識認同的建構，除了奠基於羅香林等人的客家論述，以及胡文虎在南洋各地串聯倡議客屬公會的建立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卻也至為關鍵的部份，即由胡文虎所創立的龐大報業集團扮演的關鍵性傳播角色。

在早期的南洋社會，僑團、僑校與僑報被譽為是僑社三寶，其中華文報紙更是當地華僑社會的重要精神食糧，扮演著串聯當地僑社與中國訊息的角色（沈儀婷 2007：114）。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前主任李金生即清楚指出華文報紙在當地社會的重要性：

凡是會館、學校、社團有慶典的時候，這些報紙一定報導，甚至於他們開會，請一些什麼人從外國來的、從中國來的，這全部的過程他們都會報導。所以基本上他們講話，都一字不漏地在報紙上刊登出來。會議記錄也是會一字不漏的在報紙上刊登。... 民間的資料，對於華人社團的、以及華人的思想、華人一切的東西，只有在報章上看得最清楚（王力堅 2012：215）。

胡文虎的報業集團，自 1923 到 1952 將近三十年間，先後創辦《仰光日報》、《緬甸晨報》、新加坡《星報》、《星洲日報》、《星中日報》、《英文虎報》、汕頭《星華日報》、重慶《星渝日報》、廈門《星光日報》、香港《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星島晨報》、《英文虎報》、檳榔嶼《星濱日報》、泰國《星暹日報》、《星暹晚報》等，他以私人資本之力形成龐大的星系報業，也串聯起東南亞與中國間的

聯繫與交通。胡文虎熱中辦報的原因，僅管他不諱言地闡明其初衷在於為自己的虎標良藥產品打廣告，以擴張銷售通路：「為了宣傳萬金油，與其花錢登廣告，為什麼自己不辦報？」，然而，除了協助擴大永安堂的事業之外，胡文虎的龐大報業卻也發揮了相當弘揚中華文化的效果（邱松慶 1994：57-58）。舉例而言，新加坡的星洲日報除了“國內電訊”和“國內通訊”等專版外，也另有專欄評介有關故國、故鄉的文化資料。甚至 1979 年馬來西亞霹靂永定同鄉會在出版會慶紀念特刊時，還必須仰賴於星洲日報的資料來補充當地耆老已說不清的永定歷史與故事（羅懿 1987：48-49）。

胡文虎創辦的十幾家星系報，以華文報紙為大多數，主要出現在東南亞各國與中國大城市，尤其分布在華人聚居地或是僑鄉的中心都市，中國則集中在閩粵兩省與香港，透過報紙專欄傳布各地聲息，《星洲日報》甚至在 1932 年 8 月，為了因應中國日益緊張的局勢，首度打破南洋華文報界的出版慣例，將出版時間改為每日早晚兩次出版，早版 6 點、晚版下午 6 點後發刊，共八大張報紙，讓南洋的僑民得以即時同步獲知中國最新消息，不再像過去必須遲延一天才能獲知消息，這項創舉也為《星洲日報》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劉娟 2008：54）。在當時東南亞華文報的每日銷售量少有超過四五千份的，但《星洲》創刊後在數月之間，其銷售量即超過 7,000 份，並且一直持續增長，1937 年攀上高峰，甚至高達 60,000 份，同時期的《南洋商報》為 26,000 份，《南洋總匯報》僅為 9,000 份，顯見星洲的銷售量遠遠超過其他家報紙。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星系報業的行銷網絡甚至跨越南洋以及中國，遠至北美及歐洲，成為星洲最大的華文報紙（沈儀婷 2013：81、89）。

在《星洲日報》創刊前，《星報》曾發行〈星洲日報的先聲〉積

極為其進行宣傳，在首頁清楚揭示《星洲日報》的創刊目標：

努力於工藝商業的提倡—商業家工友們，不可不看本報  
努力於教育事業的改造—教育家學生界，不可不看本報  
努力於婦女運動的宣傳—新時代的婦女，不可不看本報  
努力於新舊文學的創造—愛好文藝人士，不可不看本報

（〈星洲日報的先聲〉第一版）

可見胡文虎明確界定他的目標讀者為受過教育的實業家、教育界、學生、新時代婦女以及文藝人士等。同時胡也相當清楚報紙所擔負的功能，在這份宣傳星洲日報的小報裡，除了介紹報館新穎的設備、以及創辦人與編輯部之外，也刊載了《星洲日報》的創辦宣言，他將報紙定義為普遍的社會教育，宣告《星洲日報》必須承擔反映、指導輿論，並且積極介紹傳遞學說與新時代思想，以及作為流通消息媒介之使命。儘管星洲創報以來即強調作為華僑的報紙，整份報紙報導方向以即時傳遞中國情勢為主，其次才是本地與馬來亞的「地方新聞」，與此同時也各自有一個版面刊登廣東跟福建的地方新聞。胡文虎雖然身為星洲日報的老闆，但整份報紙裡客家元素並不明顯，毋寧說「華僑」概念更為重要。會館的新聞通常登在地方新聞版面，平常消息並不多，偶有舉辦設宴、歡送會，時而刊登胡文虎個人前往香港、暹羅、返抵新加坡的訊息。

整體而言，客屬總會十年的紀念活動是在中國抗戰脈絡下隱微進行的，報刊大部份版面報導的是一手的抗戰消息。星洲日報只有在客屬總會十周年紀念活動會期間，以報紙頭版刊登胡文虎以客屬總會主席身份介紹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的新聞，鼓勵客家人應該人手一本《客家研究》以閱讀、認識客家。並且陸續在藝文版刊



登羅香林《客家研究的新方向》之連載專文。儘管如此，在整體中國抗戰大脈絡的限制下，以胡文虎為首積極籌備進行的客家總會十週年紀念活動，仍舊相當善用報紙媒體宣揚客家意識、召喚各地客屬人士，胡並且憑藉著旗下豐厚報業集團的實力，搭配其領導南洋客屬總會的活動做宣傳。舉凡客屬總會的決議與相關活動，均能在其派下的報紙上看見訊息，不僅如此，客屬總會的決議與活動同樣也能在其他家報刊上閱讀。舉例而言 1938 年 11 月 28 日《總匯新報》晚版第二版即刊載客屬總會董事會關於酬賑月捐成績的報告，以及當日詳細的會議議案，包括董事會議決推銷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一書，贈送各報館社團與學校，以廣宣傳。並且發佈策動各坡客僑組織客屬公會之決議。1938 年 12 月 16 日《南洋商報》刊載〈客屬總會決議組織各地分會派丘子夫范長峯往各埠接洽該總會并發表告客屬同人書〉的報導，呼籲客僑團結起來，聯絡聲氣：

吾屬同僑客居南洋各地的很多，大埠小埠工廠商場無處舉之，從前因無具體的組織，...精神渙散，以致彼此隔膜。每遇國內外有事的時候，或覺聯絡不足，力量單薄.....親愛的客屬同僑們，起來吧，在生活鬥爭的今日，團結才有力量。希望吾屬賢達，本著團結就是力量的原則，踴躍地負起組織客屬分會的偉大認為，完成本總會的目的。<sup>4</sup>

<sup>4</sup> 參閱南洋商報 1938.12.16.page8 :

<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aspx?articleid=nysp19381216-1.2.67.1&sessionid=8785b3d4011e46cdb9374543adb2d8cc&keyword=%E8%83%A1%E6%96%87%E8%99%8E&search=advanced&fromdate=19381201&todate=19390831&articles=1&advertisements=1&illustrations=1&letters=1&obituaries=1&miscellaneous=1&newspaperTitles=beritaharian%2cdailyadvertiser%2ceasterndaily%2cmalayansatpost%2cmiddayherald%2csingchronicle%2csingdailynews%2csingmonitor%2csingweekherald%2cstraitsvocate%2cstraitschinherald%2cstraitseurasian%2cstraitsmail%2cstraitsoobserver%2cstraitstelegraph%2cstoverland%>

各地客屬公會響應成立的消息亦陸續刊載在報章上，如《南洋商報》12月27日刊載〈彭亨立卑客屬同人即響應組織會館〉、以及年1月1日，馬六甲客屬分會開始籌組的訊息：〈馬六甲客屬同僑籌組客屬分會籌備委員經即席舉出〉。在胡文虎大力推廣號召下，柔佛、檳城、令金、一麻峇昔等地客屬公會紛紛在1939年陸續進行籌備組織，范長峯更授命前往各埠協助，並統一名稱為某埠客屬公會（南洋商報 1939.3.17, p.10）。胡文虎旗下最重要的《星洲日報》的社論更是數度大篇幅刊載客家的論述，宣揚客家精神，號召客屬兄弟的團結。1938年12月16日，《星洲日報》早版刊登胡文虎〈客家精神論〉全文，即清楚地界定客家精神：

所謂客家精神者，不外為刻苦精神，武勇精神，奮鬥精神，團結精神，冒險精神之結晶體，而此諸種精神者，實為人生欲圖創立偉大事業者所必須，而尤以當此國難嚴重時期，凡我黃帝子孫，有志於復興民族挽救國家者，所迫切需要，然則吾客人之客家精神，即擴而大之，使成為中華民族之精神可也，或善運用之，使成為救國精神，亦無不可也。客屬同胞更應以“發揚客家精神為己責”，為了發揚客家精神，必須「自能聯合能團結始，欲圖實現大聯合大團結，當自健全南洋各屬客屬團體之系統組織始，惟我客屬弟兄，其共起圖之」，強調肯定各地成立客屬總會的重要性（星洲日報 1938.12.16 早版，p.2）。

1939年8月24-27日南洋客屬總會邀集各地客屬公會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舉辦十週年慶祝活動，早在5月即開始準備籌備委

員名單，大會名稱以及決定正副主席，8月11日〈檳城客屬公會擬定提案選定三代表出席星洲大會〉、8月12日〈客屬總會各地公會推派代表出席大會已正式函報者已有廿餘處計五十餘名〉（南洋商報1939.8.11，p.15、1939.8.12，p.8）。8月19日《總匯新報》刊登要求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的招待應提前到會好分配任務的訊息，為客屬總會慶祝活動的開幕慶祝埋下伏筆，21-22日《總匯新報》陸續報導歡迎客屬公會代表抵達新加坡的訊息，以及學校參與遊藝會的演習活動。8月23日《總匯新報》的社論刊載〈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的文章，並且發布兩版《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遊藝酬賑祖國難民大會特刊》，內容除了〈籌賑祖國難民大會宣言〉、〈客屬總會十年史略〉，以及隔日代表大會會議日程與大會綱要之外，更詳述胡文虎設宴招待各公會代表的消息，並且刊登胡文虎在歡宴會上致辭的全文。有趣的是在這份特刊裡甚至刊載了林森與蔣中正的簽名，以及許多政要如孫科、宋子文等人的題詞。



圖 1、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遊藝籌賑國難民大會特刊

資料來源：《總匯新報》1939.8.23 第二版。

《星洲日報》在 8 月 23 日當天同樣是以早版刊載《客屬總會十周年紀念遊藝仇振祖國難民大會特刊》方式呈現，內容與《總匯新報》的特刊相當。晚版則多了一版專門討論客屬總會紀念會之《召開大會目的》，並同時刊載胡文虎開會的致詞內容，強調客屬十週年的紀念會一方面是為了紀念總會成立十年，期待能夠號召各地客屬團結一致，另一方面也重申團結以共赴國難（星洲日報 1939.8.23，晚版，p.5）。除此之外，星洲日報當天社論《客屬團結與民族團結》，更是強調客屬的限界不存在血統、地域與宗教文化，而存乎於語言與其精神，客家刻苦剛強團結冒險精神對於民族的復興有著重大意義，繼而話鋒一轉批判某些幫派結黨營私、破壞團結：「苟同僑各幫派之中，不幸有一幫派之領導者，限於此等錯誤，則結果必引

起別幫之反感，促成幫派對立，此時幫派之存在，乃真成為民族團結之一大障礙矣...」（星洲日報 1939.8.23，早版，p.2）。換言之，該篇社論強調客屬總會成立意義在於團結各邦客屬兄弟，以謀求更大的團結、復興民族為至上的目標，與一般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之幫派有別。

1939 年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活動舉辦期間，每天都有大篇幅的報導即時記錄會議活動的進行，包括總會議決要為胡文虎鑄像做紀念、以及每日最新會議議程與臨時動議等等，直到 8 月 29 日歡送客屬公會代表離開才停止。隨著報紙詳載紀念活動的報導，讀者們也彷彿共同見證了一場各地客家族群集結為國的聚會。除此之外，《星洲日報》自八月二十六日開始，也陸續在藝文版連載羅香林討論《客家研究的新動向》的文章。

縱上以觀，胡文虎旗下龐大的報業集團，不僅協助東南亞各國的華人與中國、香港等地廣大華文讀者們跨越了地域的限制以及語言溝通的隔閡，而其革命性地修改報紙出版時間的創舉，更讓各地讀者能夠及時分享同步的訊息，將人們串聯起來。儘管當時報紙作為「想像共同體」的推動器，形塑凝聚的主要是「華僑認同」—協助人們在海外共享整個中國發展情勢的連結。但胡氏派下龐大的報業集團，在傳遞客家社團活動訊息以及宣揚客家族群論述的方面依舊擔任了重要媒介，尤其胡文虎身兼香港與新加坡兩地客家總會會長的身份，更是扮演串聯各地客家社團舉足輕重的角色。胡在籌備客屬總會 10 週年紀念活動時，大力推動支持總會派人到各地協助籌組客屬公會，並贊助各地建立客家會館的經費。在象徵層面的意義上，將原先各地分散的客家社團都歸於客屬總會的統籌之下，直接帶入人與人的團結—使得客家共同體的形成成為可能。

#### 四、結論

1920 年代初是客家首度從區域性分散的地緣性團體（如增城會館、嘉應會館等），聯合起來形成「客屬」組織的重要年代。然而這群來自不同祖籍地，彼此間的腔調及語言使用甚至是難以相互溝通的客家人並非理所當然即能夠形成一個想像的共同群體，相反地，這需要一系列細緻的打造過程：人們必須要有團結串聯的需求，並且形成一套群體的論述，實際參與社團的組織行動，加上新興的印刷報章作為傳遞的媒介，始能凝聚共同體的共識，將人們成功地串聯在一起。客家族群在土客衝突中意識到自己，為了抵抗外界的污名，人們首度有了集結的需求。在嚴苛的幫群競爭中，客家族群意識到團結的必要，透過跨域的串聯，擴大群體的力量。1920 年代開啟的客家共同體的想像即是在這樣的時代脈絡裡應運而生，胡文虎以其優勢串聯起香港崇正總會與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兩地組織，1930 年代號召建立各地客屬公會，將豐沛的資源投入客家社團，19 世紀以來開始的客家研究而由羅香林集大成的客家論述，透過胡文虎的報業系統與其社團網絡成功地將其傳遞給各地的客家人，從而成功地塑造一個跨越省籍、國界，以方言群認同為主的客家想像共同體。儘管這個新形成的想像共同體仍然相當脆弱，並且受到戰爭因素所中斷，戰後有些客屬公會也未能成功復辦，客屬認同仍有與祖籍地緣認同並立的狀況（安煥然 2009：95）。但這個時代由客家社團、學者與企業家所共同創造催生的新興客家想像群體卻也成為日後「客家」想像論述的重要養分。

## 參考書目

- 王力堅，2010，〈南洋客總與抗戰前期的中國—以《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十週年紀念特刊》為研究中心〉。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 \_\_\_\_\_，2012，《新加坡客家會館與文化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創作室。
- 丘權政，1997，《客家與香港崇正總會》。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 石炳祥，1997，〈香港崇正總會的創立及其貢獻〉。《嶺南文史》4：53-55。
- 安煥然，2009，〈馬來西亞柔佛客家人的移植及其族群認同探析〉。《台灣東南亞學刊》6（1）：81-108。
- 吳靜娟，〈獨立前後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的作用〉。收錄於黃賢強主編《新加坡客家文化與社群》。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 李培德，2012，〈華商跨國網絡的形成、延伸和衝突—以胡文虎與陳嘉庚競爭為個案〉。《華人研究國際學報》4（1）：53-74。
- 沈儀婷，2007，〈客家人的文化企業—胡文虎的星系報業研究〉。收錄於黃賢強主編《新加坡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_\_\_\_\_，2013，《譜寫虎標傳奇》。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
- 林正慧，2013，〈華南客家型塑歷程之探究〉。《全球客家研究》1：57-122。

- 邱松慶，1994，〈略論胡文虎創辦星系報的動機及其效果〉。《華僑華人歷史研究》3：57-62。
- 施添福，2013，〈從「客家」到客家（一）：中國歷史上本質主義戶籍制度下的「客家」〉。《全球客家研究》1：1-56。
- ，2014，〈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 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2：1-114。
- 洪永宏，1984，《出洋記—陳嘉庚外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胡文虎，1950，〈從香港崇正總會三十周年紀念特刊序〉。序文頁 1-2。收錄於羅香林主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 康吉父，1984，《胡文虎傳》。香港：龍門文化。
- 張侃，2004，〈從社會資本到族群意識—以胡文虎與客家運動為例〉。《人文社會科學報》1：73-77。
- ，2004，〈社會資本與族群意識之間：以胡文虎為中心〉。收錄於石亦龍、郭志超主編《文化裡論與族群研究》。合肥：黃山書社。
- 陳承寬，1950，〈香港崇正總會三十周年紀念特刊序〉。收錄於羅香林主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序文 3-4。
- 陳麗華，2005，〈香港客家研究綜述〉。收錄於劉義章主編《香港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 劉娟，2008，〈虎豹家族事業—胡文虎一族與星系報業〉。收錄於黃賢強主編《新加坡客家文化與社群》。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



- 中文系、新加坡南洋客屬總會、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
- 鄭赤琰，1999，〈香港崇正總會與客家學開展〉。頁 1-10，收錄於《族群研究論叢》。香港：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 賴郁如，2013，〈客籍人士的中國－南洋互動：以饒芙裳研究為中心〉。收錄於林開忠主編《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 謝佐芝，〈由客家人說到創建南洋客屬總會〉。《東南亞研究》6：58-59。
- 羅香林，1950，〈香港崇正總會史〉。頁 1-21，收錄於羅香林主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 \_\_\_\_\_，1950，〈客屬海外各團體之組織及發展〉。收錄於羅香林主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
- \_\_\_\_\_，1992，《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
- 羅懿，1987，〈我所知道的胡文虎生平〉。《龍岩師範學報》1：46-53。
- 《星州日報的先聲》，1929，收錄於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新加坡國大中文圖書館數位典藏。
- 《總匯新報》，1938.11.28，收錄於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新加坡國大中文圖書館數位典藏。
- 《總匯新報》，1939.8.19-28，收錄於東南亞華人歷史文獻。新加坡國大中文圖書館數位典藏。

《南洋商報》，1938-1939，收錄於 National Library Board。新加坡政府數位典藏。

《星洲日報》，1938.12.16，收錄於 National Library Board。新加坡政府數位典藏（膠卷）。

《星洲日報》，1939.8.23，收錄於 National Library Board。新加坡政府數位典藏（膠卷）。

《星洲日報》，1939.8.26，收錄於 National Library Board。新加坡政府數位典藏（膠卷）。

Anderson, Benedict, 2012, 《想像的共同體》。台北：群學。

胡冠仁，Oral History Project title: Chinese Dialect Groups. Accession No. 2910.